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

陈元甫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是南方百越民族中最为强大的一支——于越族所建立的国家。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越国历史文化有着许多独特内容,如越国上层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等。近年的考古调查发掘新资料及相关的研究探索揭示,墓上堆筑长方形覆斗状封土、使用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岩坑)木椁墓制、墓外较普遍地设置陪葬器物坑以及完全用仿青铜原始瓷或硬陶的礼器与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等,都是越国贵族墓葬葬制葬俗中颇具特色的几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越国 贵族墓 葬制葬俗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越国贵族墓葬葬制葬俗的研究,是越文化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最近几年,浙江地区陆续发掘了绍兴印山越国王陵^[1]、东阳前山春秋晚期墓^[2]、长兴鼻子山战国墓^[3]、安吉龙山战国墓^[4]、绍兴漓渚“猪肉岙”战国墓、嵊州小黄山战国墓等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大型越国贵族墓;与此同时,江苏省的同行在无锡鸿山也发掘了一批越国贵族大墓^[5]。这些发掘成果填补了以往越国贵族墓葬考古材料上的空白,为研究探索越国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条件。此外,温岭塘山东瓯国贵族墓葬,因其与越国贵族墓具有明显传承关系,对于越国贵族墓葬葬制葬俗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6]。本文主要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结合其他考古资料,对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作一初步研究,并对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认识与讨论。

—

众所周知,地面堆封土是商至春秋时期越族土墩墓的特点之一,与“墓而不坟”的周制葬俗有着显著区别,具有强烈的民族与地区特色。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葬,虽一直保持着墓上封土的传统,但封土形态较原先土墩墓却有了明显的不同,已由原来的圆形或椭圆形馒头状,改变成了长方形覆斗状。已发掘的绍兴印山越王陵、东阳前山D2M1、长兴鼻子山M1、安吉龙山D141M1、嵊州

小黄山战国墓和无锡鸿山邱承墩墓的封土都是如此;在绍兴平水至上灶一带^[7]和安吉古城外围^[8]调查发现的一大批越国大墓,其封土也无一例外地呈长方形覆斗状(图一)。因此,长方形覆斗状封土是越国贵族墓葬最具特点的地面标志。这种封土底部平面呈长方形,立面呈四面斜坡状向上收拢,四坡挺直,顶部平整,形似长方形覆斗,也象一个土台。很显然,此种形状的封土,肯定不会是象土墩墓那样随意堆筑而成,它除了可能是因覆盖长方形墓坑和墓道所需之外,必然还有其它方面的主要原因。古人事死如生事,墓葬建筑或许是受到当时居住建筑的影响。这种覆斗状封土,颇似当时



图一// 绍兴上灶庙前山大墓长方形覆斗状封土



图二// 安吉龙山 D141M1 全景

中原地区贵族们使用的地面宫室建筑之夯土台基,因此,很可能是模仿中原贵族地面宫室建筑的有意之作,只不过墓葬是把应该建在台基上的建筑转入到了地下。

大量材料显示,自春秋晚期开始,在与封土形态发生变化的同时,越地的墓葬形制也开始由传统土墩墓向土坑墓转变,并且随之普遍设置墓道和木椁。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上层贵族的墓葬中。东阳前山春秋晚期墓石室状甬道与浅土坑木椁墓室相结合的形制结构,或系代表着越国墓葬由传统土墩石室墓向土坑木椁墓转变的过渡形态;春秋末期的印山越王陵带墓道的衢大深墓坑和木椁,则可视为此时期越国上层贵族已开始放弃传统土墩墓制而采用新的土坑木椁墓形制的典型代表。进入战国,带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已为越国贵族普遍使用,已发掘的长兴鼻子山M1、安吉龙山D141M1和绍兴漓渚“猪肉缶”战国墓^[9]和无锡鸿山邱承墩越国贵族墓都系此种形制(图二)。2006年发掘的嵊州小黄山战国墓,封土呈长方形覆斗状,墓坑东西长10、南北宽5.2、深约1.5米,平底墓道长约7米,方向朝东。墓葬未经盗掘,墓外有一个陪葬器物坑^[10]。1990年杭州市考古所发掘的半山石塘M1战国墓,坑底东西长14.9、南北宽5.4、深1.1米,斜坡墓道位于东壁正中,墓向朝东。此墓早期被盗,但墓内仍出土了原始瓷器、漆器、琉璃器、玉器、玛瑙、水晶杯等34件珍贵文物,特别是“在距墓坑北壁约8米处,还发现呈一字排列的仿青铜原始瓷钟、铎、句鑃等乐器30多件”^[11]。在印山越王陵以西、大潜蟒山上探明的另一座越国贵族大墓,墓坑长20、宽7米左右,墓道向东,也是一座带墓道的竖穴深坑木椁墓^[12]。在绍兴平水、上灶、漓渚和安吉龙山已发现的一批越国大墓,虽未经发掘,但根

据封土长度、盗洞深度和从盗洞翻上来的膏泥与木炭可以判定,这些大墓也都具有深大的墓坑和墓道,墓内构筑有木椁墓室。上述众多墓例表明,到了战国时期,越国上层贵族已完全放弃旧有的土墩墓制而全部采用了新的带墓道土坑木椁形式。

野外遗迹现象显示,越国贵族墓使用的木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平面呈长条形,立面两面斜坡状,横断面呈三角形;另一种是矩形箱式平顶木椁。第一种木椁以最早发现的印山越王陵为代表,此后的东阳前山D2M1和安吉龙山D141M1依据野外迹象也可判定是此种形式,表明此类木椁并非王陵所独有。2004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沿线发掘的40座土墩墓中,于多座一墩多墓的小型带浅坑墓内发现有两面坡的木棚建筑遗迹现象,发掘者指出,“这类木棚建筑与浙江印山越王陵的形制较为类似,实际上可能就是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坡椁室”,并认为“这一新发现说明印山越王墓中木构椁室的出现具有当时社会的丧葬习俗背景,并不是越国特有的习俗,也不一定是贵族身份的标志”^[13]。这种颇具特色的木椁形制,甚至在闽越国和南越国大型贵族墓中还得完整保存^[14],充分说明越文化的源远流长。

第二种矩形平顶状的木椁,是中原周文化和其它先秦墓葬普遍采用的形式。根据野外迹象可判明使用这种木椁的是长兴鼻子山M1。此墓木椁完全腐朽,当时紧贴木椁处填少量木炭,木炭以外填膏泥。清理时,填土上部平面上呈现的长方形木炭分布线,显示出原先木椁的位置和大小。从剖面看,炭线上部略外敞,下部基本垂直,平面围合范围上部略大,下部略小,而且填土越往下清理,四周木炭的内侧边线就显得越加整齐与清晰,这一迹象为我们判定原先墓内木椁是呈矩形直壁平顶形态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墓道的设置是越墓形制结构重要组成部分。墓道均设在长方形墓坑的一头短边正中,平面呈甲字形。以设在东面者居多,墓向主要朝东。印山越王陵、长兴鼻子山M1、安吉龙山D141M1、无锡鸿山邱承墩等众多大墓的墓道均是朝东。但情况也非全部如此:象东阳前山D2M1墓道开在西边,墓向朝西;德清梁山战国墓,墓道开在南边,墓向朝南^[15];而绍兴漓渚“猪肉缶”大墓墓道甚至开在北边,墓向朝北,可见,越国贵族墓的墓道朝向没有严格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定制,但应以朝向东面为主,可能反映着这一东方民族以东为尊的思想。

我们注意到越国贵族墓墓道形式明显分斜坡

状和平底状两种,而且墓道形式与墓内木椁形式紧密相关。长兴鼻子山M1和杭州半山石塘M1的墓道呈斜坡状,根据野外迹象可以判定长兴鼻子山M1是矩形平顶状木椁。印山越王陵、安吉龙山D141M1、绍兴漓渚“猪肉忒”大墓均系平底墓道,东阳前山D2M1也基本可归入这种形式,而根据迹象可以判定这些大墓均是两面斜坡状木椁。由此已可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斜坡墓道者,墓内木椁呈矩形;平底墓道者,墓内木椁呈两面斜坡状。这种现象颇具规律性,可知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表明越国贵族墓的墓道形式与墓内木椁形式紧密相关,可能是由木椁形式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不论是封土形式,还是墓葬形制,以及墓道与木椁的使用等,都与此前流行的传统土墩墓已有着明显的不同,说明随着于越的正式建国,埋葬制度也随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这种现象不能不认为是越文化特征性因素的重大变革。从现有资料看,这种变革的原因,似乎不能完全在越文化自身找到答案,应该主要来自外部文化的影响。竖穴土坑、墓道的设置和严格的棺椁制度,是中原商周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南方楚文化的重要特征。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楚、越两国干戈相接、玉帛相通,越文化和楚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与交流也成为必然。勾践灭吴后迁都琅琊,其争霸中原的过程中,也势必会努力吸收与模仿中原周文化。一般来说,丧葬文化的影响,会首先反映在上层贵族墓葬中,因此,中原周文化或楚文化的竖穴土坑、设置墓道和棺椁等葬制,就首先在越国上层贵族墓中出现,并自上而下逐渐流行开来,从而呈现出与中原和楚国墓葬颇多一致的风格。

二

近些年的发掘资料表明,越国贵族墓比较普遍地设有墓外陪葬器物坑,器物坑作为葬制葬俗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成为越国贵族墓葬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近几年的一个重要认知和新的突破。迄今为止,明确发现陪葬器物坑的已有长兴鼻子山M1、安吉龙山D141M1(图二)、嵊州小黄山以及安吉笔架山D131M4^[16]等4座墓葬,此外,温岭塘山东瓯国贵族墓中也有发现。由于对越墓陪葬器物坑的明确发现与认知,始于2004年发掘长兴鼻子山M1,此前发掘的印山越王陵、漓渚“猪肉忒”大墓、东阳前山D2M1等,因受发掘经验和认识上的局限,对是否有陪葬器物坑的存在,未作有意探掘寻找,故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实际上在长兴鼻子山M1之前,陪葬器物坑应早已出现。如

1995年在绍兴福泉猪头山满坑出土76件原始瓷和大件印纹陶的遗迹^[17],和1990年在半山石塘M1墓坑北侧8米外出土一批钟、镈、句鑃等仿铜原始瓷乐器的遗迹,显然就是墓外陪葬器物坑。

已发现的资料揭示,越国贵族墓葬的陪葬器物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陪葬器物坑与墓葬的相对位置非常统一与固定,均设在朝墓葬方向的左侧。长兴鼻子山M1、安吉龙山D141M1、嵊州小黄山、杭州半山石塘M1这四座墓的墓道都朝东,器物坑均设在墓葬的北侧。安吉笔架山D131M4和温岭塘山M1的墓道都设在西边,墓向朝西,器物坑设在墓葬南侧,因此,就相对位置而言,陪葬器物坑的位置还是在朝墓葬方向的左侧,与上述四墓仍显一致。这样,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一种颇有规律的现象,陪葬器物坑设在墓葬北侧还是南侧,与墓葬的朝向紧密相关,是墓葬的朝向决定着器物坑的相对位置。即墓道向东者,器物坑即设在墓葬北侧;墓道向西者,器物坑就设在墓葬南侧。陪葬器物坑设在墓葬朝向的左侧显然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位置。

第二,陪葬器物坑的具体位置并不十分一致。有的在墓坑前半部之外侧,如长兴鼻子山M1和安吉笔架山D131M4;有的在墓坑与墓道连接处的肩部外侧,如安吉龙山D141M1;而嵊州小黄山战国墓和温岭塘山东瓯国贵族墓的陪葬器物坑,则往前移到了墓道的外侧。这些具体位置上的不同与变化是否与墓葬的年代早晚或等级高低相关,目前尚不清楚,需要通过更多发掘材料进行分析与总结。

第三,陪葬器物坑与墓坑的距离因墓而异,并不固定。有的距墓坑较远,在封土以外,不为封土所覆盖;有的距墓坑较近,在封土以内,被封土覆盖。材料显示,陪葬器物坑与墓坑距离上的大小,可与墓葬级别的高低、规模的大小相对应。级别高、规模大的墓葬,器物坑就设在距墓坑较远的地方,不为封土覆盖。如长兴鼻子山M1器物坑距墓坑4.7米,安吉龙山D141M1器物坑距墓坑达10.5米,温岭塘山M1器物坑距墓道5.5米,杭州半山石塘M1器物坑距墓坑可能达8米。而级别较低、规模较小的墓葬,器物坑则设在距墓坑或墓道较近的地方,被封土覆盖。如嵊州小黄山战国墓规模比上述诸墓要小,器物坑就在墓道的边侧,安吉笔架山D131M4规模更小,其器物坑则紧挨墓坑。

第四,陪葬器物坑内均放置陶瓷器,无青铜器和玉石饰品,其组合关系有四种情况。第一种:绝大部分是仿青铜乐器,另有少量仿青铜礼器,主要

是一个乐器坑,如长兴鼻子山M1。此墓在陪葬坑内放置了原始瓷和硬陶的甬钟、钲、句鑃、钲、鐃于、磬共35件,另有12件原始青瓷与硬陶的压席之镇。第二种:全部是仿青铜的陶瓷礼器和其它日用品,没有仿青铜的乐器。如安吉龙山D141M1。该墓器物坑长达11、宽3米,前半部被彻底扰乱破坏,后半部残存170件器物中,除印纹硬陶瓮、坛、罐和一批原始青瓷的杯与器盖等日用器物外,也有原始青瓷的兽面纹鼎、豆、盒、孟和硬陶的鉴、盘、圈足炉、镇等仿铜礼器,但没有发现仿青铜的乐器。第三种:主要是一般的日用器,另有少量仿青铜礼器,没有仿青铜的乐器。如嵊州小黄山战国墓器物坑内放置的器物,除了印纹硬陶的坛、罐等日用器外,还有一些泥质陶的豆、夹沙陶的附耳鼎等仿铜礼器。第四种:全为一般的日用器,无仿铜礼器与乐器。如安吉笔架山D131M4器物坑内陪葬的17件器物全部为印纹硬陶坛。以上四种不同的器物组合情况,器物坑内仿铜陶瓷礼器有无、数量的多寡、质地的优劣,应该都与墓葬的规模与等级相关。

三

商周时期是流行青铜器的时代,中原或其它诸侯国的贵族墓葬,随葬青铜器显得十分普遍,墓主身份越高,随葬青铜器数量就越多,青铜器是墓主生前身份、地位和拥有财富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是否随葬青铜器,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未能给出明确答案的难题。这一方面是因过去受材料的局限,大型墓葬发掘少;另一方面是缺乏随葬品保存完整的墓例,多数墓葬已遭盗掘,随葬品保存不全,不足以反映随葬品的原貌,为准确认知越国贵族墓有否随葬青铜器的问题带来一定困难。以往对于墓中未见青铜器的现象,大都与被盗掘破坏相联系。所幸是最近几年,浙江陆续发掘了一批规模较大的越国贵族墓,特别是有几座未遭盗掘,随葬品保存完整,如东阳前山D2M1、长兴鼻子山M1和嵊州小黄山墓等,为我们准确认知越国贵族墓葬是否随葬青铜器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比较充分的考古学依据。

这里所说的青铜器,是指大件的礼器与乐器,非指兵器与生产工具。我们从东阳前山、长兴鼻子山和嵊州小黄山这几座未遭盗掘的墓葬中看到,不论是墓内还是墓外陪葬器物坑,都没有发现一件青铜器,所见者都只是仿铜的陶瓷礼乐器,这种现象显然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应表明它们本来就没有用青铜器随葬。1997年,绍兴县文保所在

皋埠凤凰山清理一座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墓(M3),此墓以出土刻有“越王不光”铭文的玉矛而闻名。墓内出土遗物达94件,其中虽有铜器11件,也不过是一些剑、环和镞而已,并非大件礼乐器,但在原始青瓷和泥质黑陶中却有仿铜的钵、匜、熏、鼎、壶、甗和盆等礼器^[18]。此墓也未遭盗掘,只是前部被施工破坏,墓中没有随葬青铜礼乐器的现象,也应是它的实际原貌。以上这些未遭盗掘的典型墓例,无疑有助于我们认定越国贵族墓不用青铜器随葬的事实。因此,象杭州半山石塘M1这座大墓虽遭盗掘,并出土较多玉石器等珍贵文物,却不见青铜器,可能并非是青铜器被彻底盗走的结果。

诚然,浙江地区不少地方曾出土过商周时期大件青铜礼乐器,但这些铜器绝大部分都是在施工或取土中零星出土,无组合共存关系,原迹无墓葬迹象,有的甚至出土在河沟或山坡,似非墓葬随葬品,应是其它性质的遗存。只有黄岩小人尖^[19]、瓯海杨府山^[20]和绍兴306号墓^[21]出土的三批有大件礼乐器的铜器,是明确的墓葬随葬品。另外,安吉三官出土的鼎等商代铜器也可能是出于墓葬^[22]。

乍一看来,台州黄岩小人尖和温州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出土铜器的现象,表明早期的越族土墩墓中就有随葬青铜器之传统;而绍兴306号墓大批青铜器的出土,似乎更说明在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中,有随葬青铜器现象的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考古资料表明,土墩墓作为于越正式建国前的墓葬形制,在浙江主要分布于杭嘉湖、宁绍和金衢地区,丽水地区至今尚无发现,东南沿海的台州和温州地区,目前也只发现小人尖和杨府山两座。浙江已发掘的土墩墓达数百座,其中不乏规模颇大者,但出土青铜礼乐器的却仅此两座。从分布看,这两座土墩墓恰好都是个别存在于东南沿海的台州与温州,与杭嘉湖、宁绍和金衢地区大量存在的土墩墓不随葬青铜器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据文献记载,商周时期的杭嘉湖、宁绍和金衢地区,是百越民族中最为强大的于越族的分布区域,而丽水、台州和温州这一东南沿海较小区域,以及与之相邻的闽北地区,则是瓯越族的分布地区。瓯越族是百越的一支,与于越相邻,同属越文化系统,但也存在某些自身特点,考古材料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从浙江已发现的商周时期印纹陶遗址看,可分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地区和瓯江水系4个区域,除瓯江水系的面貌与闽北有许多相似之处外,另外3个区域的总体特征还是比较接近的,表明温州、台州和丽水3个地区以及与之相邻的闽北地区,确实存在着一支有别于浙

江其它地区的古文化类型,其创造者就是瓯越人。商周时期这一地区流行形制独特的石槨墓,随葬青铜兵器、工具以及礼乐器,都充分说明这一地区在葬制葬俗上确有它的独特之处^[23]。因此,这一地区的个别土墩墓中随葬青铜礼乐器的现象,也就显得不足为奇,它反映的正是这一地区独有的葬俗特点。因此,黄岩小人尖和瓯海杨府山这两座西周土墩墓,应是瓯越人的墓葬,墓内出土青铜礼乐器的现象,不代表于越族墓葬有随葬青铜器的传统,更不能代表越国贵族墓的葬俗特点。安吉三官出土的商代鼎等青铜器虽非正式发掘出土,但从伴出有玉璜、玉珠和玉环这一情况看,原存遗迹是墓葬的可能性较大。安吉地处浙皖交界,该批铜器年代又早,即使是墓葬,也可另作别论。

排除了黄岩小人尖、瓯海杨府山和安吉三官墓之后,在浙江杭嘉湖、宁绍和金衢地区已发掘的二百多座土墩墓当中,就没有随葬青铜器的实例。这就清楚地表明,不用青铜器随葬一直是于越建国前土墩墓的一种传统葬俗。

浙江已发掘的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越国墓葬,包括大墓与小墓在内,数量已在百座以上,但至今出土大件青铜礼乐器的只有绍兴306号墓一例,这一情况既与越地的土墩墓传统葬俗不相吻合,也和近几年发掘的一批越国贵族墓情况相悖,这就涉及到此墓是否为越墓的问题。绍兴306号墓发现于1982年,是一座有阶梯墓道又带壁龛的土坑木槨墓,规模并不很大,发掘前西壁已遭破坏。墓底南北长8.14、南端残宽5.4、北端残宽2.5、深2.8米。墓道开在东壁的南端,方向朝上坡,宽3.4、长1.5米,有四级台阶。南壁有壁龛,龛下有土台。随葬品包括铜器、玉石器、金器等共1000多件,内有玉耳金舟、四角跪人像铜插座、铜房屋模型以及青铜的汤鼎、圆底鼎、鍬盃、甗、釜、炉、尊等一大批重要文物,其中1件汤鼎的盖内与肩部和1件炉的底部有徐国的铭文。随葬品中无原始瓷器,仅2件印纹软陶罐和1件泥质灰黄陶豆。发掘者推断是一座战国初期的越墓,墓主人可能是越国相当于卿大夫的巫祝一类人物。然而,由于墓葬形制的特殊和2件有铭徐国铜器的出土,有些学者对墓葬的国属提出了异议。有说是徐墓^[24],有说是越墓^[25]。因受当时发掘资料的局限,省内可资直接对比的材料尚少,讨论双方均未能获得更多考古材料的支持。时至今日,通过这些年发掘的一批越国贵族墓,有足够的证据使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了可能。现有考古资料越来越有力地支持了绍兴306号墓并非越墓的观点。

第一,从墓葬形制看,它与越墓明显不同。浙江已发掘的其它春秋战国越墓,已由传统土墩墓改变成了竖穴土坑木槨墓,大中型墓还常常带有墓道;墓道都开在墓坑某一短边的正中,方向朝下坡;墓道底部或平底或斜坡式。因此,绍兴306号墓除了土坑木槨与已见越墓相同外,其它如墓坑设壁龛,有土台,墓道不仅朝上坡、而且开在墓坑一角,底部又呈阶梯式等特点,至今在浙江尚未发现其它相同墓例,它的存在是一个孤例。而其使用的土坑木槨形式,是这一时期南北方普遍流行的墓葬形制,并非越墓的典型特征。

第二,从随葬品组合情况看,它也不是越墓特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如上所述,越墓中不随葬青铜器。绍兴306号墓随葬大量青铜器,不见富有越文化特色的仿铜原始青瓷礼乐器,也无一般的原始青瓷日用品,在浙江已发掘的众多越国墓葬中,同样是个孤例,更何况出土青铜器中确有2件带铭徐器。有学者根据出土铜器的铭文和纹饰,曾认为绍兴306号墓出土的这批铜器,是春秋前期越建国之前,徐人势力进入浙江之后在当地制造的,并非是几经辗转的越人战利品^[26]。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绍兴306号墓确实应该不是越墓,而可能是徐墓,墓内随葬青铜器的现象并不代表越国贵族墓葬的葬俗特征。因此,排除了绍兴306号墓为越墓之后,建国后的越国贵族墓葬不随葬青铜器的葬俗特点,便也得以廓清了。

无锡鸿山发掘的7座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中,邱承墩特大型墓出土原始青瓷器、陶器、玉器、琉璃器等多达1000多件,是迄今发掘的越国大墓中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器物质量最高的随葬品^[27]。值得注意的是,7座贵族墓都没有青铜器,特别是在邱承墩如此高级别的贵族大墓和如此丰厚的高等级随葬品中,也没有发现一件青铜器的存在,而只是一批原始青瓷或硬陶的仿铜礼乐器而已。这为我们认定越国贵族墓不用青铜器随葬的客观事实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考古学依据。诚然,邱承墩大墓曾遭一定的盗掘,但没有青铜器的现象恐非盗掘所致,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在大量精美玉器都得以保存的情况下,青铜器竟会被盗掘得如此彻底?如若这7座大墓原先均有青铜器随葬,那么青铜器被盗掘一空的现象,也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更何况其他6座大墓中,有几座是没有遭盗掘的。

以上分析清楚地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仍一直保持着不用青铜器随葬的葬俗传统,而代之以仿青铜的陶瓷礼乐器,这是越国贵族墓葬主要的葬俗特征,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

区文化特色。因此,可以认为,以瓷代铜仿制礼乐器随葬,一直是越人埋葬习俗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种特有的文化传统。

有研究者认为,越国贵族墓不随葬青铜器,是因为不具备随葬青铜器的实力,并指出,“当时部分越国贵族(其中一部分可能为南逃的徐、舒人)虽然已经不具有随葬铜器的实力,但为了保持上层社会的礼仪习俗,因地制宜选择以仿铜原始瓷器和陶器来代替铜器随葬”^[28]。此种观点看似合理,其实并不尽然,因为越国的经济实力绝对不会低下到连上层贵族都无法随葬一件青铜器的程度。于越为百越之首,是百越中最强大的一支,在允常之际开始“拓土始大,称王”,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3年一举灭了强大的吴国之后,又北上争霸中原,接着又迁都琅琊,在一个时期内,越兵横行于江、淮,勾践成为一时的霸主。勾践去世后,子孙代代相传,霸业仍然持续,直到公元前333年楚败越。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要使用几件青铜器随葬,应该是完全办得到的事情,墓中没有青铜器随葬,绝非国力不及所致。因此,我们认为越墓中不用青铜器随葬,应该反映了越国比较务实的精神。铜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贵重物品,资源的稀缺和连绵的战争,又迫使越国把有限的青铜资源首先使用到最为需要的农具和兵器的制作上去,用以发展生产、壮大军队、增强国力。而墓葬陪葬品只是让死者带到冥冥世界去“生活享用”的东西,并非实际使用的物品。陶瓷品原料廉价、制作简便,其可塑性强和入土不朽的优点,自然成为越人首选的青铜替代品。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由于越民族特有的丧葬习俗所决定的,是于越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德清梁山战国墓中还发现有用仿青铜斧、铍、钺等原始青瓷工具与农具随葬的现象,则更可作为佐证。而就在墓葬中的作用而言,这种仿铜陶瓷礼乐器与青铜礼乐器有着相同的意义,同样是一种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同样蕴含着等级礼制的丰富内涵,在彰显使用者身份地位上也与青铜器具有相似的作用。越国贵族墓这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葬俗,突出体现了古代越人求真务实的民族精神,集中反映出于越民族精勤耕战的民族文化。

- [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年第1期。
-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 [5][27]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
-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温岭市塘山西汉东瓠贵族墓》,《考古》2007年第11期。
- [7]2002年冬,笔者与绍兴县文保所的葛国庆同志一起,曾对越都绍兴城外围的大型越墓分布情况进行过专题调查,发现了一大批封土长度在60米以上的特大型墓,这些墓葬除少量分布在绍兴西南部的漓渚镇外,主要集中在绍兴县南部的平水至上灶一带,有迹象表明,这一带很可能就是越国的王陵和显贵墓葬区。
- [8]程亦胜:《安吉古城土墩墓考古调查》,《东方博物》第六辑。
- [9]2004年发掘,规模宏大,墓坑南北长达25、东西宽6.8~7.2、深1.6~1.75米,平底墓道方向朝北,彻底盗掘,未留随葬品。
- [10][15]本所发掘资料。
- [11]《余杭文物志》,中华书局2000年;马时雍主编:《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
- [13]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镇江市博物馆、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句容及金坛市周代土墩墓》,《考古》2006年第7期。
- [14]《武夷山发现西汉闽越国贵族墓》,《中国文物报》2003年8月20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16]田正标、黄昊德:《安吉县笔架山战国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年,文物出版社。
- [17]周燕儿、蔡晓黎:《绍兴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东方博物》第14辑。
- [18]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绍兴凤凰山战国木椁墓》,《文物》2002年第2期。
- [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
- [21]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 [22]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文物》1986年第2期。
- [2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陈元甫:《浙江“石棚”遗存的初步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7年。
- [24]曹锦炎:《绍兴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4年第1期;林华东:《绍兴306号“越墓”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 [25]牟永抗:《绍兴306号越墓刍议》;钟遐:《绍兴306号墓小考》,《文物》1984年第1期。

[1][1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阳市博物馆:《浙江东阳前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8年第7期。

[26]曹锦炎:《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4 年第 1 期。

[28]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A Preliminary Study on Funeral System and Custom of Noble Tombs of Yue State

CHEN Yuan-fu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Zhejiang 310014)

Abstract: Yue State, built by Yu Yue, the strongest one of the Ethnic Groups of Bai Yue in the South, rose abruptly in the Spring & Autumn period in the Taihu Area with unique historical cultural traits such as the funeral system and custom of noble tombs, and so on. The new discoveries, relevant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have gradually brought to light major aspects of the above-mentioned system and custom: the rectangular and inverted-cup-shaped tomb mound, the rectangular earth (rock) pit and outer wooden coffin with tomb passage, the accompanying pit for funerary objects outside the tomb, the proto-porcelain or hard pottery sacrificial vessel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which imitated and replaced the bronze ones, etc.

Key words: Yue State; noble tomb; funeral system and custom

征稿启事

《东南文化》杂志是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1985 年创刊,目前被录入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HSS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期刊……

《东南文化》于 2009 年改版后,定位于中国大陆东南及港、澳、台地区乃至日、韩等东亚诸国文化遗产的探索、研究、保护、展示与利用等,加强了对文化遗产从保护、研究、管理到继承、欣赏、展示诸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的关注,以适应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新内容、新趋势和新要求,凸现文化遗产地位,彰显东南地域特色,并努力打造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从而推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主要栏目有:东南论坛、遗产保护理论、考古探索、地域文明、博物馆新论、专题研究、域外广角等。

《东南文化》真诚欢迎专家学者投稿,尤其欢迎有关遗产保护和相关学科探索的理论文章。现将稿件格式启示如下:

一、敬请作者提供文稿的同时尽量提供电子文本。文章的题目、100~300 字的内容提要、关键词、

作者单位需提供中英文各一份,并附作者简介(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称、主要研究方向、邮政编码)。

二、来稿以 1 万字内为宜,并要求文字精炼、标题准确、层次清晰、资料新颖、观点鲜明、图文并茂;引文核对准确,注释一律置于文末并注明详细出处;线图、拓片及照片质量精美,凡线图、拓片及照片为复印件的来稿,一概不用。

三、自收稿之日起,编辑部将在 6 个月内答复处理意见。如在此期限内未收到录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稿件并告知我刊。稿件一概不退,敬祈自存底稿。

四、本刊将已刊内容提供网站传播,为维护作者权益,免生著作权纠纷,凡不愿网络传播的作者,请在投稿时予以声明。

五、稿件请寄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延误登记或遗失。

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321 号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

邮政编码:210016

电话:025-84806201

电子邮箱:dnwh@chinajournal.net.cn